

# 喧嚣背后的乡愁

## ——以新世纪乡土小说及诗歌为例

李明燊\*

**【摘要】** 新世纪乡土小说与诗歌创作在喧嚣时代下呈现为多元并置的格局,它既关乎着世俗文化的大众接受维度,又与多重审美旨趣的建构密不可分。其中,乡土小说与诗歌的互渗是新世纪文学创作的重要特征,作家行走在表意与抒情的字里行间,并在纷繁表象的背后寻求自我内心沉潜的乡愁。小说与诗歌内在的关联性是文学精神架构自觉与自在的状态,诗性的乡土具有现实主义气质的人文关怀,又具有浪漫主义审美旨归的诗性怀乡,从而,知识分子在历史的内省中去自觉探寻现实建构的开放性与合理性。

**【关键词】** 新世纪;乡土小说;诗歌;乡愁;现实主义

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乡土其本身就具有区别于城市文明的审美特质,乡村的自然性决定了其文学书写诗性的传统。乡土小说也不例外,从表面上看,浩瀚的叙事似乎与诗歌的表征不相协调,但乡村慢节奏的生活与农民朴质的性格使其蕴藏着诗化的内质,诗性并不随社会历史的变迁而改变。新世纪乡土小说承续了乡土文学的诗性特质,无论是现实批判还是诗意感怀,亦或是历史的鸟瞰,新世纪诗歌对乡土社会的呈现与乡土小说的表现形式一脉相承。当然,与中国20世纪文学激进主义的革新史不同,新世纪乡土小说与诗歌的创作态度显得较为温和,乡土小说的诗性关照在对现实的体悟过程中渐渐走向作家的内心。不同的时代影射着作家心境的不同,随着文学接受群体的扩张与诗歌写作的大众化倾向,作家与公众的双向互动也使乡土小说走向了新世纪诗歌发展的普泛化轨迹。同时,作家依旧代言着知识分子的精英阶层,他们以自我的诗化想象重构起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乡愁,其强调的是民族性与独异性,在全球化语境下,这种对本民族的文化反思显得尤为重要。

### 一、审美失范时代的现实主义关怀

在新世纪文学喧嚣的表象下,中国现代文学知识分子的乡愁传统并没有因为这种世俗的骚动而泯灭,在新的时代,乡愁被赋予了新的形式与内容,并建构起自身文化言说的向度,这是值得庆幸的

---

\* 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300071。

事情。乡愁不再只是精英知识分子带着启蒙的预设俯视乡土中国的代名词,他们渐渐地开始以平视的角度去审视他们所经历的世界,这是一种文学的生命体验,更为真实,也更为深切。新世纪文化多元主义使审美标准失去了统一的规约,在审美失范的时代,“由于急躁,他们被驱逐出天堂;由于懒散,他们无法回去”<sup>①</sup>,这是当下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身份处境。喧嚣的时代致使多变的人文价值形态,知识分子心境的躁动使这个时代缺少“伟大”;他们并不“懒散”,只是缺乏一种超越世俗之上的人生体悟。当然,知识分子的现实主义关怀依旧在乡土小说的溪流中暗涌,知识分子的乡愁并未中断。就乡土小说而言,作家的“土”性是重要的质素,即民间化与平民化的书写,而在情感的把握上更要具备诗歌的抒情性,诗性是乡土小说不可或缺的艺术形式,同时,诗歌的叙事性也往往为情感的表达提供先行的铺垫。新世纪乡土小说在现实主义人文关怀的维度上与诗歌找到了契合点,尤其是在对民间底层人的关注上,乡土小说与诗歌存在不谋而合的默契。

民间写作的概念并不专属于新世纪,在1990年代,民间写作就已经开始形成了潮流。然而,新世纪之后的民间书写呈现为与以往不同的新的质素,乡土小说与诗歌的互渗表现在诸多方面,作家在新的时代下的现实主义关怀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方面。尤凤伟《泥鳅》描绘了出身农村到城里打工的城乡边缘人的众生相,他们的社会身份是尴尬的存在,城市不接受他们,乡村又不是他们想要的归宿,在两难的境遇中,乡土走出的底层人只能陷入悲剧的泥潭。新世纪诗歌对这种社会底层人的书写也是较为深刻的,并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底层人写底层人的现象,如打工诗人的自我诠释就具有较强的现实感。郑小琼的诗歌写出了打工者最为平凡而艰苦的生活:“你们不知道,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合同,头发正由黑变……我透过寂静的白炽灯光/看见疲倦的影子投影在机台上,它慢慢地移动/转身,弓下来,沉默如一块铸铁/啊,哑语的铁,挂满了异乡人的失望与忧伤。”(《生活》)郑小琼带着这样一种冷酷的叙述方式,揭示出打工者的生存状态,用了诸多代表着现代工业文明的意象,如工卡、流水线、合同、白炽灯、机台等,这些意象组合在一起就像是一块冰冷而毫无生气的铸铁,而人在这样的环境下便成了机器生产的一个环节,在这里,不需要有任何情感的表达,人被彻底异化和物化了。铁一般冰冷的现代制度磨去了人的一切棱角,每一个体都充当着集体无意识的贡献者。

作家对底层的言说表现在乡土小说与诗歌上的形式有所不同,小说家往往是久居城市的精英阶层,其对底层人的审视往往是建立在社会地位差距基础上的俯视,虽他们在竭力靠近乡土底层审美的经验,但毕竟不是底层之人,无法从根本上体悟另一群体的生活。而诗歌的底层写作者有些本就是底层出身,即使底层的生活经验向诗性经验的转化看似并不那么容易完成,但转化一直在努力地进行着。在城市化高速扩张的新世纪,从中国乡村来到城市的打工者的队伍不断壮大,并构成了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与知识分子作家以写作为生不同,打工者的生活第一要考虑的是生存的问题,而出自打工者之手的诗歌便是叙写他们怎样活在现实中的真实的灵魂。乡土小说创作在时间维度上不具有新世纪诗歌这种亲身经历的真实性,专业作家对底层的书写很难从自身灵魂深处找到与表达对象的共鸣,他们写出来的所谓“真实”实际上恰恰是对真实的否定,因为这已经是一种被概括了的抽象化的“真实”。当然,此种说法也不可过于武断,新世纪乡土小说也不乏具有现实主义深刻性的优秀之作,鱼龙混杂的新世纪诗歌更需要人们去仔细甄别优劣。

一方面,乡土小说如贾平凹《高兴》里的刘高兴的角色就显得过于文学性与理想化,城市底层人的属性是缺失的,刘高兴乐观的生活哲学被过度夸大,而且他可以周旋于各个社会阶层之间而从容自如,其并不具有代表性,这并非乡村走入城市的农民的性格。虽然在小说结尾处又再次复归到

---

<sup>①</sup>[奥]卡夫卡:《卡夫卡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页。

了城市底层人现实的悲剧命运作为小说的结尾,但是小说的整体格调略显戏谑化与荒诞化。而刘庆邦《神木》则具有极强的社会洞察式的现实主义格调,小说既揭示了人性恶的一面,又呈现了人心向善的一面。小说讲述了矿工杀“点子”于煤窑井下,制造自己是死者亲属的假象,从而在窑主那里骗取抚恤金,而最后矿工的良心战胜了邪恶,以自己的死换取了“点子”的活。会讲故事的刘庆邦其自身就是农民出身,也有当矿工的经历,因此,他讲述底层人的故事就显得游刃有余,并且又极具现实主义的悲剧色彩。周大新《湖光山色》旨在揭示乡村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农民个体的精神裂变,意在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并批判了当代社会功利主义哲学对人性的异化。小说的现实主义批判性具有明显的立场,即作家以乡土社会为立足点去“审判”现代性带来的一切恶果,这种二元对立叙事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较为普遍,作家的主观预设代替了现实观察,缺乏思想的深度与内容的广度,从而造成乡土小说书写的程式化倾向。

另一方面,一些新世纪诗歌关注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发展的现状以及农民在社会历史裂变中的境遇。杨键《小镇》在冷静的素描式写作中揭示出在当下城市化高度发展的今天乡村的被遗弃和破败的场景:“那种人的淤泥似的清凉的痛苦/已经不再有了/有的只是欲望失败后的垂头丧气/有一个叫‘三五斗’的茶馆里/三四个农民/像几具干尸/围坐着一张牌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互相躲开/再看,眼睛再躲开。”这样一幅类似鲁迅所批判的乡土国民的形象再次出现在21世纪的文学创作中。一个世纪过去了,一样的是依旧麻木。不同的是,一个世纪之前的乡土国民有的只是麻木,而一个世纪之后,在现代性侵蚀下的乡土中国无处躲藏。都市对人的物化以及对城市异乡人的排挤造成农民生存状况的堪忧,表现出来的麻木的眼神是对生活的无奈和绝望之后的“坦然”。诗人剥去繁花似锦的外衣,将笔触伸向被现世遮蔽的阴影之处,揭示出时代背后的中国最广大底层人的真实生活,这是一种现代性催生出来的城市异乡人的乡愁。“一个诗人,如果没有灵魂扎根的地方,没有精神的来源地,是很难写出好作品来的。”<sup>①</sup>诗人正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表达一种寻根的文化意蕴,一种异乡人来到现代都市的孤寂与忧伤,他们的选择唯有在前行中迷失,在迷失中前行。

诸多新世纪的乡土小说与诗歌的创作在多元主义的文化语境下造就了文学表现形式与内容的差异性。然而,作家对现实的关注一直未变。同时,乡愁不仅来自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而且也来自于底层人的内心,这是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度情感体悟。无论是乡土小说还是诗歌,其彼此的共通性是对以都市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性的否定,以及对社会弱势乡民的同情,作家已经形成了一种对社会的意识形态化的判断模式。然而,当公众无休止地去批判主流强势话语而呈现一边倒地支持社会弱势群体的时候,会否使得这种以伸张正义为名的行为,演变成另一种“主流”呢?城乡一体化时代的乡土小说与打工诗歌固然揭露了社会发展背后的阴暗面,在肯定其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这种潮流有泛滥的倾向。底层群体为生存苦于奔波,生活无保障,文学虽表现出了这一群体的苦难,但由于自身思想体系架构的贫弱,使得这种社会批判显得单调而乏味,千篇一律的感慨有无病呻吟之嫌。“由此看来,进步和颓废似乎的确是紧密相连的:生在一个新时代的人较他们的先辈更进步,但同时却又不及先辈们有作为;绝对而言,通过知识的积累他们知道得更多,相对而言,他们自己对于知识的贡献是如此之少,以至于他们可以被毫不冤枉地比作侏儒。”<sup>②</sup>在某种程度上,新世纪诗歌过于直白的语言使诗歌失去了诗性的特质,真实性与生活化的强调使诗歌趋向小说叙事化的特点,形式上的“祛诗性”以及驾驭文字上不如小说自由也使诗歌在表现内容及思想性上越发的苍白。

我们不妨将乡土小说与诗歌看作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整体,在相对开放的时代,知识分子的话

<sup>①</sup>谢有顺:《乡愁、现实和精神成人——论新世纪诗歌》,《文艺争鸣》2008年第6期。

<sup>②</sup>[美]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1页。

语空间也相对宽松,但体制对精英群体的收编依旧主导着文化系统的运作。随着社会知名度的提升,一个有能力引起人们产生广泛共鸣的诗人注定要成为文化体制收编的对象,各种评奖活动以及职称、官衔的给予,使作家很难保持自我内心对于文学的坚韧与持守,身份不同了,心境也不一样了。即使对于那些致力于批判与揭露的作家而言,殊不知,这批判与揭露的过程就是创造另一种新权威、新主流的过程。当现实主义的民间化写作风靡于当下之时,也许正是另一种主流即将诞生的前兆;当知识分子批判现代工业文明侵蚀传统乡土文化的时候,文学书写其本身就在进行着一场“自我异化自我”的过程:现实主义正在由自然而变得做作。虽然这只是一隐性的流变,还远没有构成一种潮流,但我们需要具有忧患的意识,因为中国自“五四”以来的历史反复地证明着这个民族的极端性,颠覆“此在”已经成为百年来中国历史的主调。由于这种极端,走向现代的中国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新世纪乡土小说与诗歌的写作也同样要提防以现实主义之名的极端化演变。

## 二、后现代视阈下知识分子的诗性怀乡

新世纪之后,小说及诗歌领域在后现代语境下知识分子的诗性怀乡似乎并不比1980年代的“文化热”要逊色,只是这样的潮流是以散点的形式进行着,并没有形成一种共鸣式的流派,当然,这也与文学不再像80年代那样受到人们追捧的缘故有很大的关系。文学怀乡的潮流在新世纪后的确存在着,然而,在后现代多元并存的当下,这里的“乡”不再是传统狭隘意义上的与都市相对的乡村,而是与文明西化相对的“中国本土”的概念,这里既包括与“城”相对的“乡”,也包括与“乡”相对的“城”,这是一个总体的民族的范畴。知识分子的乡愁往往带有浪漫主义的诗性特质,对历史的回眸与对现实的慨叹构成了新世纪文学现象的一部分,抒情化的表征是乡愁的内质,并表现为悲凄的感伤主义的情怀。

现代性的各种质素在新世纪之后已经几乎渗透到中国的各个角落,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中国正在向世界强国加速前进。然而,在西化的现代性以摧枯拉朽的攻势改变着传统中国的背后,隐藏着的却是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认同危机。与现代性相伴而生的现代主义在西方有过这样的阐释:“现代主义施于人的自然创作冲动的压抑较之个人的力量是大得不成比例的,如果谁倦于此道或干脆在死亡中逃脱,那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事情。现代主义应整个地置于一个标题之下,这个标题便是——自杀。”<sup>①</sup>现代主义虽在某种程度上是反现代性的,但在另一个侧面,艺术上的现代主义,尤其是文学,是反传统的,这种传统正源于“自然创作冲动的压抑”,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也正是继承了西方现代性反传统的衣钵,其本质是东方对西方的戏仿。因此,随着国力的增强,知识分子迫切要求在知识体系上摆脱一直以来西化的枷锁,带有民族自我认同情结的乡愁在作家的灵魂深处再次激荡,他们纷纷直逼现实或追忆逝去的“桃花源”,去寻求自我情感的寄居地。对于诗性怀乡的概念,中国文学有两条主要的创作路向,即以现实为坐标的“关注现实”和“远离现实”,新世纪之后,这两条道路的发展与论争依旧延续着,即使不再有太多人去关注了。其中,乡土挽歌构成了新世纪乡土文学及诗歌创作重要的一部分,这里有对乡土式微处境的哀叹,有逃离现世的沉潜而去求索乌托邦的意象。小说家与诗人纷纷致力于书写乡土中国颓败的现实。

一方面,新世纪乡土小说如《秦腔》通篇运用“挽歌体”叙事,小说的格调也旨在揭示乡村在现代化浪潮下的自身困境与试图摆脱困境的过程,而结果也注定是无奈的徒劳。贾平凹的乡土小说在很

---

<sup>①</sup>[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94页。

大程度上取决于时代的变迁,他是跟随在时代背后的作家,并表现为对社会历史变化的被动反应,因而,这就注定其创作缺乏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先锋性。从这方面来看,《秦腔》的思想性就略显匮乏,刻意制造一种城市的繁荣与乡村的荒芜的因果关系,老一代农民似乎无论怎样坚守与挣扎,都无法改变“现世的无情”,作家态度鲜明地单向度叙事使小说缺乏历史的广度与现实的深度。赵本夫《无土时代》运用反讽与荒诞的笔法,描述了现代城市的极速扩张侵蚀乡村土地空间的事情,小说人物破坏城市的水泥地,要让泥土暴露出来,让野草生长出来,憎恶坚硬的地表,进而排斥一切现代性因素。作家赵本夫显然是以现代城市的反叛者自居,这种激进的价值立场在当下较为盛行,也为他们赢得了相当于“传统文化捍卫者”的好名声,然而,这掩盖不了作家人文意识形态的偏颇,此种“乡愁”显然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及文学的审美性,这种小说只能成为新世纪乡土文学模式化书写的典范,而不会在文学史上产生怎样的影响与价值。孙惠芬《上塘书》则是另一种风格的乡愁,它有“京派”小说的余韵,在宁静朴质的乡村叙写中,展现当代乡村的风俗民情。这是个有自己的时间、自己的历史、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又非与世隔绝的地方,小说的格调是慢节奏的诗性怀乡,并以萧红式的散文笔法来呈现同样是萧红式的乡村人情百态的众生相。这一系列风格的小说还有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陈应松《到天边收割》、王跃文《漫水》、张炜《刺猬歌》等,在诗意化书写与眷恋式追忆的同时,也在另一个层面上隐现着大时代背景下乡土世事的变迁与人性的裂变。

另一方面,新世纪诗歌以诗化的向度述说了中国乡村现实的变迁与历史的探寻,如陈先发《前世》,“要逃,就干脆逃到蝴蝶的体内去/不必再咬着牙,打翻父母的阴谋和药汁/不必等到血都吐尽了。/要为敌,就干脆与整个人类为敌”,诗人在灵魂与现实的碰撞中产生极具张力的诗语,这是对生命本真的求索,更是对自我灵魂深刻的拷问。汶川地震后朵渔写下《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今夜,我必定也是/轻浮的,当我写下/悲伤、眼泪、尸体、血,却写不出/巨石、大地/团结和暴怒!/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今夜,人类的沉痛里/有轻浮的泪,悲哀中有轻浮的甜/今夜,天下写诗的人是轻浮的/轻浮如刽子手/轻浮如刀笔吏。”诗人没有一味地去悲天怜人,而是将审视的视角扩大到整个人类,并进行了诗人自身对现实的内省。同时,有些诗人并不认同现代都市,但又对乡村的落后持否定态度,矛盾的内心造成了困惑与迷惘的现代病,由此衍生出来的乡愁不再是单向化的批判现代性或揭露乡土落后的单纯化向度,后现代语境下的乡愁,更多地体现着与时代同步的多元化复杂性。诗人将情感寄托于想象中的没有被现代性因素沾染的中国传统田园山水之中,如徐俊国、雷平阳、杨键、牛庆国、田禾、熊焱、谷禾、沈苇、叶舟、鲁若迪基等,相应的作品有田禾《喊故乡》和《望故乡》、潘洗尘《一片稻田有多丰富》、雷平阳《梨树》等。柏桦《水绘仙侣》通过历史人物的情感故事为线索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幅如画的江南,也是一幅幅如画的挽歌,传统的江南只存在于画作和想象中,读来总有一种绝唱式的悲凉:“家务是安详的,余闲也有情:/白日,我们在湖面荡舟……夜里,我们在凉亭里私语/直到雾重月斜/直到寒意轻袭着我们的身子。”诗人寄托着远离世俗喧嚣的田园乡愁,将自我从现实中抽离,去追索乡土民间的田园生活。

乡土小说怀乡情结的本源来自于田园牧歌的诗性乡愁,诗意的感怀渗入乡土叙事的肌理,即使时代的变迁使这种诗性的表现形式发生某种程度上的变化,但乡土的传统文化属性决定了其在文学创作中与现代性存有的距离感。然而,这种乡土文化气浓重的乡愁味也许更多的是停留在作家的意念之中,是作家自我构筑的乌托邦语境,是当下作家去追溯中国传统文人气质的一种文化想象,这种意境更多的是活在当下的作家去追索充满“陌生化”的返归自然的新鲜感。假设让他们真正地抛弃现代社会并回到古代的田园山水之间的时候,恐怕作家的情感寄托又会是另一种选择了。那种意境也许并不像作家想象的样子,即使在古代,那些田园诗人也大部分是仕途上不如意而不得不选择寄情于山水。因此,思乡怀古在当下的盛行需要我们去客观地审视,无论是诗歌还是诗意化或挽歌式

乡土小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乡土想象的模式,即以过去的笼统的时间点为追忆的对象,与现在相区别的曾经是美好的所在,而作家自己其实也无法具体说清那究竟是在多么遥远的过去,何时何地?没有人知道。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代中国许多作家并不爱这个其身处的时代,他们不喜欢现实中的生活状态以及周围的人和事,对一切的世俗充斥着本能的厌恶,但又无力去改变些什么。因而,他们只有通过文学来表达其对现世的态度,如果我们可以暂且将新世纪文学的怀乡情结概括为“挽歌体”与“追忆体”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无数幽怨的情绪充斥着新世纪文学的字里行间,而作家一旦以幽怨心态去写作,就很难保持一种没有偏见的创作。

新世纪文学两条道路的发展与周作人先生关于中国文学载道派与言志派的划分可以找到共通之处,即“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sup>①</sup>。言志派的“志”,即是个人情感,而载道派的“道”,即是社会功能,中国文学的历史即是沿着这两条道路曲折发展的历史。然而,关注现实的“载道”一脉一直占据着中国文学的主流,而纯化文学的“言志”派相对来说不得不在主流边上游走,这与中国儒家文化的“反纯化”传统有关,文学自足论始终是被文学实用论压制着。在当下,文学的“载道”与“言志”的较量貌似找到了难得的平衡点,但这只是因为文学受社会关注度减弱、权威话语对文学的规约度也相对放松、缺乏有代表性的作品以及缺乏读者接受场等,种种原因造成新世纪文学发展的松散化格局,但这只是后现代语境下文学边缘化的一种看似混沌的表象,其内在一脉相承的正统文化因素一直未断,而且随着现代性在中国的深化,这种向本土回归的倾向将越发的明显:越现代,越民族。

因此,中国文学历来的载道一脉的统摄地位一直没有改变过,现代性视野下的载道演变成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精神,“他们消灭了传统之后,却留下文化真空并企图用西方的万灵药——科学、民主、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浪漫主义——来填满这真空。他们为来自西方的奇事奇物而兴奋发狂,从来不认真地考虑现代中国文化特性的问题。”<sup>②</sup>即使在看似多元的后现代语境下的新世纪中国,这种激进主义的余孽依旧强大,只是影响的程度相对减弱,方式相对隐晦罢了。同时,作家们不应以此为借口来抱怨当下文坛的诸多不良发展状况,将文学场域内诸多缺陷都归罪于体制的束缚,这种做法更是无稽之谈。每个生活在一个国家中的个人都要受到这个国家的体制的管理和制约,这是一个国家秩序正常运转的基本保证,没有规约就没有秩序,一个没有稳定社会秩序的国家,其他一切将无从谈起。不管新世纪作家采取哪一种方式进行怀乡,我们都没有必要去评判谁对谁错,他们都有其各自合理的情感诉求,而所谓的“体制”似乎也并没有去扼杀任何一条蓬勃发展的人文之路。因此,当下作家的任务是要去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不朽,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新世纪文学的诗性怀乡也应更为切实地做好本民族的文学经典的重塑。

### 三、历史的内省与建构的自觉

似乎当人们提起文学边缘化这样的字眼时总会带着一种悲凉的情绪,觉得这是文学走向衰落的开始。事实上,文学本就没有占据过社会中心的位置,又何谈“边缘化”,在看待文学在现实中的位置时,持平和的心态才是明智之举。在“文学速度化”的当下,曾经居庙堂之上的精英姿态显然不再适合新世纪的时代语境,作家自身的沉潜显得至关重要。新世纪乡土小说及诗歌的成就是值得肯定

<sup>①</sup>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3页。

<sup>②</sup>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306页。

的,当然,在文坛繁盛的表象下,文学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无法遮蔽,甚至要比取得的成绩更值得去关注。一种现象成为主流并不代表它就是完全正确的,即使这种现象完全符合大众的喜好,正像不是所有的真理都可以用实践来检验一样,有些真理只存在于灵魂之中。对于文学而言更是这样,真正有永恒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会完全符合大众的胃口。相反,新世纪文坛恰恰有将文学大众化、通俗化、口语化、甚至娱乐化的趋势。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否定文艺大众化,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其存在的道理,关键是要看在这种艺术形式下是否具有伟大的艺术家、所创造出的作品是否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以及是否对人的灵魂产生真正的触动。

众声喧哗的新世纪文坛正是缺乏了这样伟大的作家以及伟大作品的存在,乡土小说及诗歌在大众化的过程中,也将自身的个性泯灭,先锋性缺失,创新性减弱,大都是走着亦步亦趋的老路。即使有一些较为优秀的作家创作的有知识分子良知以及探寻“灵魂的真”的作品,但一方面,这种作品在新世纪寥若晨星的文学作品中是少数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优秀的创作也仅限于中规中矩,不管是乡土小说还是诗歌,新世纪文坛都没有能够扛起一个时代的代表性的作品,情感表达以及驾驭文字的形式依旧遵循着早已有之的艺术规范延续下来,继承的部分远远大于创新的部分。在现代社会,文学有靠近报纸式的快速传播的媒介的倾向,“尽管报纸在其印行的次日即宣告作废——奇妙的是最早大量生产的商品之一竟如此地预见了现代耐用品容易作废的本质——然而也正是这个极易作废之特性,创造了一个超乎寻常的群众仪式:对于作为小说的报纸几乎分秒不差地同时消费(‘想象’)。”<sup>①</sup>虽然小说不至于如此“沦落”,但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文学创作的加速化与浅表化已经成为了较为显性的趋势。同时,文学活动和文学事件似乎要比文学本身更容易受到公众的关注,甚至不乏利用文学来炒作自己出名之人的存在。而在接受的层面上,喜欢纯文学的人越来越少,审美评价标准上的游移不定,也造成了小说及诗歌质量的参差不齐与文坛秩序的混乱,文学本身的质素在大众化的过程中被公共话语渐趋瓦解。当然,有些作家也表现出了对现实的反抗,但终归是绝望式的抗争。

当我们回头看这短短十几年的文坛时,我想我们更需要去做的是自我的内省,去反思我们“走过”和“正在走”的路,也是为未来能走一条至少是比现在更为合理的文学发展之路做准备。纵观新世纪文坛,其喧嚣的背后隐藏着时代的焦虑,这焦虑来自每个人,是焦虑打破了文学本来的面目,而耐得住孤独的作家才会创造出不朽的作品。文学需要自我内心的沉潜,是一个“慢”的过程,而当下的作家似乎已经忘记了文学创作与社会经济发展其实并不需要同步的道理。焦虑让人无法沉下心来搞创作,这种焦虑正是现代性所催生的自我认同的虚无感。距离“五四”那个狂飙突进的时代已经一个世纪过去了,但似乎中国对现代性带来的一些问题的反思才刚刚开始。中国新文学自己的传统在哪里?曾经的白话文对文言文彻底颠覆,一个世纪之后的现在,新世纪文学依旧面临着颠覆之后如何重建的问题,当下的作家更多的是被时代所驾驭,却不是试图积极地去影响这个时代,更没有足以传世的优秀小说或诗歌来证明作家存在的价值,其自身对艺术的承载力越来越弱。文学有种失去其本身的有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独异性特征的趋势,它在逐渐与文学之外的世界相融合,文学的封闭性被瓦解,并被普泛化、工具化、程式化。近年来,全国各地各种名目的文学活动不胜枚举,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活动与文学关系不大,而只是假借文学之名来达到体制化和商业化的目的,文学却在这一艺术产业化的过程中被架空了。当然,不可否认,有相当一部分作家拒绝自身以及其创作被体制征用,他们坚守着这块纯净的领地,不被世俗所践踏,在当下,这种文人孤傲的气质显得难能可贵。

---

<sup>①</sup>[美]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叻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页。

新世纪作家必须有对文学总体性建构得自觉,一个民族不仅仅要在经济上发展,某种程度上,精神文化上的构建也是极其重要的。由于中国文化的精髓在文明西化的历史进程中被中断过,而当代文明又是架构在一个物化的概念谱系之中,因此,隐伏在现代,延续到当代并恶化在当下的中国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时代危机。而当一个民族在精神文明的发展上出现退步时,无论其物质文明发展到怎样的高度,也永远无法弥补文化缺失的代价。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之魂,其修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漫长的等待之后,能否修复,这依旧是未知的。当下作家缺乏本真的气质,一方面,新世纪文学由“个我”走向“大众”,当然,并不是说这种现象就一定是错的,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大众化的过程中,文学要警惕由“先锋”走向“平庸”;另一方面,新世纪之后,部分作家依旧在坚持着文学创作和研究的精英化与自我化的道路,但由“五四”传承下来的学院化气息直到一个世纪之后依旧浓重,理性大于感性,这不是文学应该具有的品质。如果可以,我们应该把大众化与精英化摆放在天平的两端,文学可以走向“大众”,但应拒绝被“征用”;文学可以走向“精英”,但应拒绝“束之高阁”。天平的砝码由人自己来添加,而两边添加分量的不同,自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历史似乎在轮回着,当文化激进主义在泥泞的沼泽中沉没之后,新保守主义思潮在消费主义时代开始抬头,知识分子开始召唤传统、复归本土、回到民族,他们走向了自我否定之路,否定先锋、否定激进、甚至否定现代性。

以更为宏观的世界性的视角来看,我们在现代性之路上前行的时候,不妨经常回头看看,不要丢掉我们的“根”,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回归民族性的诗性乡愁。新世纪之后的中国文学需要走的路还很长,民族化、本土化的文学建构已经刻不容缓,我们不应把一切罪过归因于所谓“市场经济”,这并不能解决问题,也不应是面对一切问题的借口。西方国家在19世纪就已经步入了现代经济形态的社会,而同时期的西方文学也是最为辉煌的时代,产生了众多伟大的小说家、诗人、哲学家、思想家等,也相应产生了足以影响世界的伟大的文学。即使我们将视野拉回中国本土,中国市场经济其实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而同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依旧有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这是一个多元并存的时期,我们也应该更多地从自身反省并找到未来发展的正确之路。新世纪文学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家和作品,这是中国文学得以延续的保障,只是缺少了伟大。人们总是在质疑这个时代艺术的平庸,这是不无道理的,极“左”的历史已经过去,当下作家在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上已经有了相对宽松的语境与较为自由的选择权,然而,“伟大”依旧无法诞生,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实际上,当下的作家大多数都缺乏一种超越现实存在的突围精神,他们身在其中,面对欲望的诱惑与纷繁世界的喧嚣,他们无法自拔。同时,新世纪文学产量的巨大使得作品缺乏思想的深度与内容的广度,缺乏细节的呈现与人物全面的把握,在成百上千的小说与诗歌的海洋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数复制品的出现,而真正具有艺术创新的作品越来越少。

作家不应放弃对生活的梦想和对灵魂的滋养,并将艺术的灵感之根扎入民族的土壤中。贾平凹在《古炉》后记中写道:“我们放不下心的是在我们身上,除了仁义礼智信外,同时也有着魔鬼,而魔鬼强悍,最易于放纵,只有物质之丰富,教育之普及,法制之健全,制度之完备,宗教之提升,才是人类自我控制的办法。”<sup>①</sup>知识分子既要对社会充满思辨的力量,也要在感性的溪流中体悟人生的无常;既要酣畅淋漓地向世界诉说灵魂的躁动,又要以沉潜的姿态低吟那难以言说的苦闷。在精神废墟上的重建是困难的持守,但“废墟”是承载历史浮沉的所在,也是唤起知识分子本土化乡愁的经典意象,在此过程中,回忆的力量渗透到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各个角落。斯蒂芬·欧文曾说:“通过回忆我们自己也成了回忆的对象——成了值得为后人记起。”知识分子需要这种灵魂深处的内省,追忆历

---

<sup>①</sup>贾平凹:《古炉·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605页。



史,审视现实,预判未来,活在当下是重要的,但未来之路如何去走还需要审慎的思考。新世纪文学应从欲望叙事走向精神升华,书写灵魂的“深”,重返现实的“真”,唤醒沉睡的灵魂,以“深度”与“真实”拓宽写作的视阈。

走向民族化,走向本土,这是新世纪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国力强大之后国人的精神诉求,百年来的文明西化使这个具有悠久文明史的国度尊严尽失,无数的中国知识分子表达了感时忧国的“乡愁”。孙惠芬回忆道:“我现实中的乡村,因为很早就有着开放的气象,我的祖辈们只信奉外边,凡是外边来的,就是好的,凡是外边的,就是正确的,从不固守什么,似乎外边,就是他们心中的宗教。”<sup>①</sup>中国从精英阶层到基层社会,人们对本土落后的哀叹以及对先进文明的向往是一以贯之的精神向度。因此,当民族强大之后,知识分子迫切要求回归民族本土文化的建构,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结也达到了空前高涨的程度,民族自尊心的重拾是新世纪的大势。然而,新世纪文学的体征呈现为越发靠不住的非理性阐释、被颠覆与被日常化的小说叙事、以及诗性淡薄而走向叙事化的诗歌形式。在世俗化与商业化的泥淖中,知识分子既不适应喧嚣的世事,而又不肯从现实中全身而退,从而知识分子乡愁的传统在新世纪表现得较为复杂,其并不是狭隘意义上世外桃源式的诗意书写,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世俗化写作,在矛盾的纠葛中,乡愁并不是单指知识分子对乡村的情感流露,其已经成为一种整体意象的诠释,这种意象就是复归本土的诗性乡愁。

(责任编辑:陆 林)

## “Homesickness” Behind Hustle and Bustle: A Theme in Regional Novels and Poems of the New Century

LI Ming-shen

**Abstract:** The creation of regional novels and poems of the new century presents a diversified pattern, which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both the masses' acceptance of and their aesthetic taste for literary works. In addition, the interpenetration between regional novels and poems forms a key aspect of the literary creation in the new century. The authors express their deep nostalgia with the help of lyric lin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literature, there is a natural connection between novels and poems. It is noted that regional literary works with a poetic quality are featured by realism for their humanistic concerns and romanticism for the nostalgia deep inside. In the course of reflecting on the history, the intellectuals consciously explore the openness and rationality of the realistic framework in their works.

**Key words:** the new century; regional novels; poems; nostalgia; realism

---

<sup>①</sup>张赞、孙惠芬:《在城乡之间游动的心灵——孙惠芬访谈》,《小说评论》2007年第2期。